

东陆



学库

文化语言学发凡

张公瑾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东陆



学库

文化语言学发凡

张公瑾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森 段贇乐（特邀）
封面设计：徐 辉

文化语言学发凡

张公瑾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益民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24千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1068-006-4/G·154

定价：18.00 元

《东陆学库》缘起

云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的前身东陆大学创办于1922年，至今已有七十余年。七十余年的发展，经历过许多光辉。尤其在三十、四十年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仿照“清华模式”，致力于高水准综合大学的建设，先后聘请了一大批名家执教云大。顾颉刚、楚图南、吴文藻、冯友兰、费孝通、白寿彝、潘光旦、刘文典、尚钺、向达、吕叔湘、姜亮夫、吴晗等等，一时英才荟萃，蜚声海内外。1946年，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1980年和1986年该书两次修订再版，云大仍跻身其中。

与自己学校深厚的历史相比，云南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年轻的学术出版机构，社龄不过校龄的十分之一。但云大出版社沾润学校深长的学术传统，以弘扬学术、推进文明建设为己任，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孜孜以寻自身立足学界的社会价值。

正如名校要靠名师的支撑，办好一个大学出版社，必然要以优秀的学术著作作为社的标识和旗帜。学术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事业，学术著作的出版并非囿于一地、一隅之功，云大出版社也应放眼全国，出版一批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于此萌发了建立东陆学库之想，旨在收集一批治学严谨、功力较深、在各学科范围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并逐渐形成规

模、贡献于我国的文化积累和现实开拓。

这一想法于 1995 年提出后，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得到了中国社科院章建刚先生及我省陈庆德先生、杨先明先生的支持。诸位先生四处为我们奔波组稿，劳力劳心、精神令人感动。特别还要提到，本学库的设立得到实业界人士温宁军先生的支持。温先生也是学界中人，曾就读于云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从事实业，并卓然有功，然未忘情学术，且深知其对社会意义，对学术著作的出版慨然相助，使经济实力不强的我们能最终开始这一事业。

《东陆学库》的建设将是我社的一项长远工程。于此发轫之时，简叙其缘起以告读者。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5 月

目 录

自 序	(1)
导论 走向 21 世纪的语言科学	(3)

理 论 篇

一 对文化的再认识	(21)
二 语言是文化现象	(36)
三 语言的文化价值	(49)
四 语言的文化气质	(65)
五 文化格局中的词	(77)
六 浑沌学与语言研究	(89)
七 文字的文化属性	(95)
八 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	(108)

应 用 篇

一 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	(121)
二 傣语方言词汇的文化分析	(128)
三 从语言探讨民族文化史迹	(140)
四 纳西族傣族语言文化的气质差异	(156)
五 壮侗语：分布与演化中的浑沌	(169)
六 民族古文字、古籍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182)

背 景 篇

- 一 世界语言概况与语言的普遍特征…………… (211)
- 二 我国的民族语言及其特点…………… (228)
- 三 历史语言学的历史命运…………… (239)
- 四 语言学与民族语言学…………… (265)

自 序

本书是一本研究性的著作，主要阐述文化语言学这个新学科的要旨和若干关键性问题。

文化语言学在我国兴起已有十多年了，但对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至今仍缺乏一致的认识。8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当时的重点还是局限在词汇层面上。后来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逐渐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进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语言的文化价值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上，从而看到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的文化价值也决不仅仅局限于词汇所反映的文化意义，而且还涉及语音、语法、语言的结构类型、谱系分类以及语言的地区分布和文字问题，这使我对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内容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但是在对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作全方位阐释的时候，语言的非线性特点就更加突出了，原来的线性分析方法就显得不够了。尽管我一直主张对以往语言学的有效方法和积极成果都应继承和利用，但它还是不能解释文化语言学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某一语言现象与某一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的对应关系有时带有随机性，有时带有穿插性，有时具有自相似性。这跟历史语言学的语音对应关系具有完全

不同的性质，无法用那样的对应规律加以说明。这时我发现7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浑沌学理论和方法，正好适合于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要求。在经过一番粗浅的研究和思考之后，我把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引用到语言学中来，这时立刻感觉到，浑沌学将使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别开生面。尽管许多具体操作问题尚待深入和完善，但文化语言学有了浑沌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将是前途无量的。

本书写作时间跨度大，而且是以专题的方式解决文化语言学面临的个案问题，同时还要结合若干语言事实，特别是我国民族语言的状况进行应用性的说明和分析，因此全书篇章之间显得结构不够紧密，而且有的问题根据专题需要，还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不便，只希望书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能给以一定程度的补偿。本书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它是针对语言的，并且是从语言出发的，但又不是局限于语言的。希望读者读了本书，能够引发对这个新学科的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语言学的思潮随时代而更易，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21世纪将迎来语言学的新时代。由浑沌学支撑的文化语言学是属于未来的。

谨以此书献给在文化语言学园地中辛勤耕耘的同行，并希望听到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衷心感谢云南大学出版社应允将本书付梓，并感谢责任编辑段贇乐同志和李森同志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劳。

本书中“应用篇·四”《纳西族傣族语言文化的气质差异》是与杨甲荣合写的，特此说明。

张公瑾 1998年元月10日

导论 走向 21 世纪的语言科学

（一）世纪交替的意义

历史正走向 21 世纪，语言学也将告别 20 世纪，走向新的世纪。

世纪交替是时间的转换，本来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在人们心理上会有一种反映，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历史是活动着的人创造的，人的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所以世纪交替在文化上也会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也往往以世纪为阶段来划分各种文化现象。

从语言学史来看，世纪也有重要意义。西方语言学史大体就可以按世纪来划分不同的阶段，例如，希腊罗马古典时期语文学从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大约 10 个世纪；中世纪语言学从 5 世纪到 15 世纪，差不多也是 10 个世纪，这期间语言学中是纯理语法即逻辑语法处于主导地位；文艺复兴前期世俗文化兴起，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依托的古典语文学大约风行了两个世纪，到后期即 17 世纪 ~ 18 世纪，有波尔·罗瓦雅尔学

派的普遍唯理语法占统治地位；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上半叶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统治时期；下半叶则有转换生成语法领一代风骚。这些都是就当时语言学的主导思潮而言，其间还有种种支流，但总体来说，语言学的主流是可以按世纪为阶段来划分的。

语言学史也像人类历史一样，越是早期其发展速度越慢，越到后来思潮更替的速度越快。现行公历是16世纪晚期改定的，其前身为儒略历，其使用范围是逐渐扩大的，因此，越往前世纪的观念越模糊，但后人以世纪的观念对从前的语言学史划分阶段，也是可行而方便的。

世界语言学史像文化史一样，其起源和发展从来是多元的。早期语言学有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和稍后的阿拉伯，它们互相影响、渗透，并沿着自身的基本轨迹往前发展。中国语言学也像中国历史一样，其演进是比较缓慢的。王力先生将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是为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的时期；隋唐以音韵为主的时期；清代文字音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和上世纪末以来的洋为中用时期。^①中国过去不用公元纪年，自然也没有世纪观念，但19、20世纪之交即1898年出版了《马氏文通》，它开始了以西方语言学分析中国语言的新时代，也是一个跨世纪现象。所以说，世纪更替在中国语言学上也有特殊意义。现在我们处于20世纪的末期，当前西方语言学思潮风云迭起，学派林立，虽说乔姆斯基势力大，但与乔姆斯基走不同道路的、研究功能语法的人，在美国就有“依存语法”、“格语法”、“关系语法”等新派别，研究数理语言学的又

^① 王力：《王力论学新著》，36~3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有“代数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应用数理语言学”、“孟德鸠语法”等新派别，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走的是与乔姆斯基完全相反的路子。我国语言学期以来比较侧重语言的具体分析，许多重要的理论发现都是在具体事实的陈列中表明的，如等韵图其实就是一张音位分布表，但我们没有音位学理论。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语言学，比较注意理论问题，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成熟，在前进道路上依然步履艰难。同时各方研究者在认识上的不统一和步调上的不一致，也使这个新兴学科成长缓慢。但这是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回顾 10 多年来对语言作文化阐释蔚然成风，已在语言研究中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其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21 世纪必有一种新的思潮崛起，占据语言学的主流地位，并拥有一个时代。在现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应是这个新思潮的准备和酝酿时期，这就提出了语言学如何走向 21 世纪的问题。

（二）语言学史 的 启示

讨论 21 世纪的语言学，有必要重新认识语言学的历史。历史是客观的，认识却是不断深化的。我们现在就要带着世纪交替的观念来认识历史，认识语言学在这新世纪到来之际必有新的走向。

在西方语言学史上，大体上是两条主线交替发展，一条主线是经验主义传统，一条主线是理性主义传统。经验主义传统可从古希腊的语法哲学开始，到文艺复兴前期的古典语文学，

再到 19 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再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人类语言学和后半叶的社会语言学。理性主义传统从中世纪的纯理语法到文艺复兴后期的普遍唯理语法，到 20 世纪下半叶的转换生成语法。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上半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处于两条主线之间，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既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又与乔姆斯基同属形式主义语言学范畴。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是音位学，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研究文体学，提出语言联盟的理论。

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经验主义传统比较注重语言的历史，理性主义传统注重语言的现状，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前者重历时研究，后者重共时研究，但社会语言学主要是共时的分析；其次，经验主义传统重视材料的积累，较多使用归纳方法，理性主义传统与逻辑相结合，多使用演绎方法；第三，经验主义传统注意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理性主义传统一般不注意语言结构本身之外的东西，索绪尔称前者为外部语言学，后者为内部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从以上三点来看，基本上属于理性主义传统，但它们又注意材料的积累，重视对语言事实的描写。这说明结构主义已带有一定的综合性质。

以上只是就语言学史的主流来说的，实际上每个时期在主流思潮之外，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思潮，构成为当时的支流或潜流，而且就是在主流思潮内部，注意的重心也不是一个，如希腊罗马时期语言理论从属于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对语言结构的描写（划分八大词类，确定名词和动词的屈折变化，句子成分的划分等），奠定了西方传统语言学的基础。再如中世纪以拉丁语法规则为一切语言的普遍语法，另一方面又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积累了许多语言知识，动摇了拉

丁文的独尊局面。文艺复兴时期基本上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思潮并存。到了 19 世纪，独领风光的是历史语言学，但又出现施密特的波浪论，表面上与历史语言学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双向互补。就是在历史语言学的鼎盛时期，还有人把普遍唯理语法当个宝，那就是被恩格斯批判的杜林。恩格斯对杜林在语言学观点上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是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为科学界所公认，普遍唯理语法也早被人们遗忘。但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突然宣布波尔·罗瓦雅尔语法是自己理论思想的先驱，陈旧了的理论在新的境遇中又复活了。科学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复活了的形态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再看 20 世纪的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并存的有人类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法并存的有社会语言学。从以上的过程来看，语言学的发展整个是在两种思潮的斗争中，是在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否定中前进的。每一次否定都有所前进，但每一次否定者都没有完全吸收被否定者的积极的、合理的成果，而那一部分没有被吸收的合理成分，又会在新的境遇中复活，又造成新一代思潮的更迭。这个历史过程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还要看到，每一次语言学思潮的更替，都不是前一思潮的延伸和继续，而是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历史语言学对于普遍唯理语法来说，完全是崭新的东西，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连续性。同样，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也是如此。试设想，在 19 世纪末如果集中了所有历史语言学的大师来一起规划 20 世纪的语言学，那也规划不出一个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虽然从历时研究转变为共时研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旧的思维框架内不可能出现思维方式的飞跃。因此，21 世纪的语言学一方面要继承

以往语言学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它从理论到方法都将面貌迥异，不可同日而语。

（三）语言学与时代思潮

另一个事实也值得我们注意，即语言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息息相关的。时代思潮往往是当时社会现实课题在思想意识领域里的反映，语言学也间接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实际，包括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

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先导，总之，它不会离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先说说语言学是时代思潮的先导，例如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之后，立刻被应用于神话学、宗教学，于是有了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后来又被应用于文学、哲学，于是又有了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等。再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之后，首先被列维-斯特劳斯引用到人类学分析中，后来又被引用到文学、甚至社会学中去。人们常说语言学是领先学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更多的情况是，语言学是时代思潮的延伸。从语言学史来看，古代语言学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古希腊罗马语言学中关于名称与事物关系的本质派和习俗派的争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争论，都既是语言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是与读经，进而理解古人思想相联系，它只是经学的附庸，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培根、洛克的经验唯物主义

和笛卡尔的思辨的辩证法，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于是在语言学上就有古典语文学和普遍唯理语法两个派别。19 世纪初在大工业发展的声浪中，语言学中有葆朴的机械论。19 世纪中期在达尔文学说风行时期，在语言学上有施莱哈尔的语言生命理论。他在《达尔文学说和语言学》一书中，主张把达尔文所建立的关于动植物物体的规律至少大体上应用于语言的机构，其谱系树理论正是达尔文学说在语言学中的反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涂尔干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孕育了索绪尔在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派。而在苏联，则有马尔搬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建立语言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20 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的大脑先天机制理论和转换方法，则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所以说，语言学从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潮紧密联系，它同样植根在当代社会现实之中。

在这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审察时代思潮的变迁，再来看语言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四）走向文化语言学

现在越来越让人感到语言学对社会实际的依附性。当代的社会实际将决定语言学的走向。

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的社会实际是什么？9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世界形势呈现一种多中心、多元化的趋势。欧美中心主义已经动摇，原来的二元对立格局也已经结束，现在滚滚而来的是民族独立和地区性组合的不可阻挡的浪潮。在这股浪潮

中被高高举起的是民族文化的旗帜，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成了国际关系中最有代表性的事实。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延顿发表了一篇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论文《文明的冲突?》^①。这篇文章认为以往的君主的权利之争，民族国家之争和意识形态冲突都已过去，将来主宰全球政治的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断层线，会是未来的主战场。作者把文化差异看成是人类最基本的差异，认为文化的特性和差异较少可变性，与政治和经济相比，更不容易协调和消解。论文发表4年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大辩论，其中责难和质疑大大超过赞同。不过，不管亨延顿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也不管其文章的论据有多少漏洞，但其客观效果却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意识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珍视。由这篇文章引起的俄底弗斯效应，对于加速西方中心主义的皇冠落地，无疑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亨延顿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其实际后果却是提高了非西方国家的警觉和民族自尊自卫心理。以亨延顿论文为起点的文化问题大辩论，将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对文化民族性的关注。可以预见，文化问题将是21世纪世界格局中众多问题里的焦点之一。

中国由于自己特殊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带着自己民族超前的敏感性，从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文化热，至今势头有增无已。在这股文化热中，产生了语言学的新思潮——文化语言学。现在大家已逐步认识到，民族文化中最鲜明的标志是语

① 原载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中文译文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3(10)。